



现代学者演说现场

◎陈平原 主编

历史的重要

章太炎

秦燕春 考释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卷



的
重
要

历史章太炎

卷

◎ 现代学者演说现场 陈平原 主编
◎ 章太炎卷 历史的重要 秦燕春 考释

山东文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章太炎: 历史的重要 / 秦燕春考释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6.7

(现代学者演说现场 / 陈平原主编)

ISBN 7-5329-2603-6

I. 章… II. 秦… III. 章太炎 (1869~1936) — 演说—选集 IV. B259.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6795 号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	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	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	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版 次	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 / 965 × 1270 毫米 1/32 印张 / 9.5 插页 / 1 千字 / 211
定 价	23.00 元

新
学
社

◎ 责任编辑：马 兵
◎ 装帧设计：张振钢 岐 周

总序

陈平原

按使用的功能，晚清以降的“演说”，大致可分为两类：一是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，二是文化传播与学术普及。前一类声名显赫，后一类影响深远；与学界同行的思路不太一样，我更关注后一种演说，因其与现代中国学术及文章的变革生命攸关。至于与“演说”三足鼎立的现代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以及报章书局的大量涌现，使得学者们很少只是“笔耕不辍”，其“口说”多少都在媒体或文集中留下了痕迹。介于专业著述与日常谈话之间的“演说”，成了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学人的生活与学问的最佳途径。于是，我决定选择章太炎、梁启超等数位著名学者作为研究对象，探讨“演说”如何影响其思维、行动与表达。演讲者“说什么”固然重要，可我更关注其“怎样说”——包括演说的姿态、现场的氛围、听众的反应、传播的途径，还有日后的“无尽遐思”等。换句话说，我希望兼及“演说”的“内容”与“形式”。

作为“传播文明三利器”之一的“演说”，与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关系密切，这点我很早就意识到，只是一直犹豫不决，到底

该从新式学堂的演讲课程入手,还是专注于某些著名学者的学问人生,抑或着重考察其与文体变迁的关系。1999年春,为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,我构思了《“雄辩会”与“讲演团”——兼及“五四”青年的文化姿态与思维方式》一文,可惜半途而废,只留下“五彩缤纷”的论文提要和一地散钱。而从谈论章太炎避难东京时如何将那些压在纸背的政治欲望,在“讲学”中借助各种穿插,表达得淋漓尽致^①,到描述国学大师章太炎、梁启超以及新文化主将胡适、周作人,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理想,怎样分别在上海、南京、天津和北京登坛说法,讲授各自所擅长的专深学问^②;再到辨析鲁迅和胡适各自的述学文体与演讲活动的关系^③,以及综合考察性质的《有声的中国——“演说”与近代中国文章变革》^④,我主要探讨的是:晚清以降,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,实现这一使命的,主要通过两个途径,一是严复、梁启超、王国维等新学之士所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、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,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(这一努力,符合百年中国“现代化进程”的大趋势,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);一是章太炎、蔡元培以及鲁迅、胡适等,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,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,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,为日后“白话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,作

① 参见《学问该如何表述——以〈章太炎的白话文〉为中心》,载《章太炎的白话文》(贵州教育出版社,2001)第1-52页;此文修改后,成为拙著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5)第四章。

② 参见《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——1922年的“风景”》,此文摘要刊2002年5月31日《文汇报书周报》,全文刊《现代中国》第三辑(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3),并收入拙著《中国大学十讲》(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2)。

③ 参见《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——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》,《文学评论》2005年第5期;《胡适的述学文体》,《学术月刊》2002年第7、8期。

④ 本文曾于2005年4月28日在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“亚洲视野中的中国学”、2006年1月20日在韩国成均馆大学举行的“东亚近代言语秩序的形成与再编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。

出了独特的贡献。

回过头来，反省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，有几点必须修正：第一，《新青年》同人在提倡白话文时，确实多以明清章回小说为标本，日后讲授“国语文学”，也都追溯到《水浒传》等；可所有这些“溯源”，都指向“文艺文”（或曰“美文”），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“学术文”。第二，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，不仅仅是“国语的文学，文学的国语”^①；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，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，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——白话能写“美文”，白话还能表达深邃的学理，只有到了这一步，白话文的成功方才无懈可击。第三，晚清兴起、五四后蔚为大观的演说热潮，以及那些落在纸面上的“声音”，包括演讲的底稿、记录稿、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，其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，不容低估。第四，章太炎等人的讲学，与宋明大儒之“坐而论道”不同，基本上是在“哲学”、“文学”这样的学科意识中展开，每讲包含若干专门知识的传授，而后才是穿插其中的社会批评或思想启蒙。第五，在表情达意方面，文言自有其长处，但绝对不适合于记录现场感很强的“演说”；学者之公开讲演并刊行讲稿，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白话诗文，都是在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，来协助完善白话的表达功能，换句话说，都是在“赞助白话文学”。第六，创造“有雅致的俗语文”，固然“以口语为基本，再加上欧化语、古文、方言等分子，杂糅调和”^②；可这个“口语”，不限于日常生活语言，还应包括近乎“口头文章”的“演说”。

以上简要的叙述，大致涵盖我关于“演说”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及文章变革所做的探索。区区论说，不如意处仍多多。恰好，我的

① 胡适：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（国语的文学——文学的国语）》，《新青年》第4卷第4号，1918年4月。

② 周作人：《〈燕知草〉跋》，《永日集》，上海：北新书局，1929年版。

几位学生对此话题也有浓厚的兴趣，于是组织他们，选择各自熟悉且欣赏的对象，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。

之所以选择蔡元培（1868-1940）、章太炎（1869-1936）、梁启超（1873-1929）、鲁迅（1881-1936）、胡适（1891-1962）、陶行知（1891-1946）、朱自清（1898-1948）、闻一多（1899-1946）等八位作为考察对象，首先基于其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。或文化名人，或学界领袖，此八人全都身负重任，一言九鼎。“演说”作为一种社会行为，对演说者的社会地位及学术声誉有很高的要求。同样一句话，不同身份的人说出来，效果就是不一样。听众之所以动不动“大拍掌”，很大程度基于对演说者的崇敬以及“前理解”。除了个人魅力，论题的选择，同样十分重要。上述诸君演说的重点，在思想文化，而不是政治动员。如蔡元培之谈论大学意义，章太炎之主张以史救弊，还有陶行知之演讲生活教育之路以及朱自清的解说诗文意蕴等，时至今日，仍有其独特魅力。

其次，还得考虑演说者的口头表达能力。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，“口若悬河”与“梦笔生花”不是一回事，适合于讲演的，不见得适合于阅读。一场主宾皆大欢喜的讲演，抽离特定时空，很可能不知所云。相反，一篇精彩的专业论文或小说散文，即便由高明的演员朗读，也不见得能吸引广大听众。讲演者的姿态以及讲演时的技巧，同样影响到演说的成败。不同于专业著述的条分缕析，讲演必须突出大思路，而且讲求幽默，语出惊人，这样，方才能让现场的听众不断地“拍掌”、“大拍掌”。而这，并非自然而然达成的，很可能是现代学校训练的结果。闻一多在清华、朱自清在北大、陶行知在金陵大学，都曾受过专门的演说训练。当然，最著名的还属胡适的故事——1912年夏天，胡适在康乃尔大学选修“一门极有趣的课程”，那就是训练演讲，此后，“这一兴趣对我

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”^①。并非每个人都像胡适那样，对演说保持持之以恒的兴趣。比如，闻一多就曾对清华的演说课程提出过批评，可最后时刻挥洒自如的绝佳表现，其实得益于其早年训练。至于鲁迅称“我曾经能讲书，却不善于讲演”^②，那是作者过谦之词；据许多听众回忆，鲁迅演说时思路之奇崛、语言之幽默，让人叹为观止。能演说，有深度，论题重要，且讲稿保留下来，这样“四美兼具”的大好事，并非俯拾皆是。

再次，“演说”与“文章”之间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学问须冷隽，杂文要激烈，撰史讲体贴，演讲多发挥——所有这些，决定了章太炎、梁启超、鲁迅、胡适等人的撰述，虽有“大体”，却无“定体”，往往随局势、论题、媒介以及读者而略有变迁。但另一方面，演说与演说者的人格、趣味以及文章体式，又是密切相关的。闻一多与朱自清性格不同，在演讲中得到充分的体现：一春风化雨，一雷霆万钧；西南联大师生回忆这两人的讲课、演说以及生活逸事时，三者之间往往能够互相印证。至于胡适与鲁迅，演说一如其文章，或文化立场坚定，高等常识丰富，清朗而畅达；或自我质疑，迂回前进，千里走单骑。当然，这两种风格迥异的演说与文章，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
最后，该说到本丛书的最大愿望，那就是：在某些程度上复原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“演说现场”。严格说来，所有的演讲纪录稿，都很难准确传达演说者的真实意图。章太炎晚年主编《制言》时，曾“屡戒少登演讲记录”；而弟子沈延国更是将传世的章氏讲演记录分为五类，称只有那些师“自撰讲稿”或弟子记录后“由师审正”者，方能作为研究章太炎思想的可靠资料来引用^③。至于鲁迅，更是清醒地意

① 唐德刚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第58页，北京：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版。

② 鲁迅：《〈集外集〉序言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7卷，第5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

③ 参见沈延国《章太炎先生在苏州》，陈平原等编《追忆章太炎》第392-394页，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7年版。

识到此中陷阱。查有记载的鲁迅演讲达五十多次,可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的只有16篇,不全是遗失,许多是作者自愿放弃——或因记录稿不够真切^①,或因与相关文章重复^②。若只是孤零零的文本,那些偶然留传下来的“演说”,自然是不尽如人意。因为,专著能够深入,教科书讲究条理,文章可以反复琢磨,演讲则追求现场效果。单纯的演说,确实不及专著或文章精深;但如果添上相关史料的考辨,使“演说现场”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复原,那意义可就非同一般了。

单是阅读记录稿,你很可能觉得,绝大多数演说都是“卑之无甚高论”。只有在现场,演说才能充分展现其不同于书斋著述的独特魅力。不单论题的提出蕴涵着诡秘莫测的时代风云,现场的氛围以及听众的思绪,同样制约着演说的发展方向。在这个意义上,理解“演说”的魅力,必须努力回到“现场”。本丛书的操作,与一般意义上的“考辨”略有不同,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某一次演讲的时间、地点、听众、论题,更希望借钩稽前世今生、渲染现场氛围、追踪来龙去脉,还原特定的历史语境。这样,才有可能让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“演说”,重新焕发生机,甚至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。

当然,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;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,只能留待读者评判了。

2006年4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① 在《〈集外集〉序言》中,鲁迅称:“只有几篇讲演,是现在故意删去的。我曾经能讲书,却不善于讲演,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。而记录的人,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,听不很懂,于是漏落,错误;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,取舍因而不确,我以为要紧的,他并不记录,遇到空话,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;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,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。凡这些,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,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。”(《鲁迅全集》第7卷,第5页)

② 参见朱金顺《鲁迅演讲资料钩沉》,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0年版;马蹄疾《鲁迅讲演考》,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1981年版。

导 言

秦燕春

近世国学大师章太炎(1869—1936),号称清学殿军、古文最后的“压阵大将”(胡适语),一生既奔走革命,又热衷讲学。提倡国故,乃为增强民族感情;融会新知,虽以清代朴学的承传人和发扬者自我期许,又能突破清学藩篱。早年标举“实事求是”,等视九流诸子,不独尊儒;中年援佛证庄,以庄证孔,重新认识新旧儒学的价值;晚年对儒学浓重的现实精神感召多有认同,颇有沟通政、学之志。曾“七被追捕,三入牢狱,而革命之志,终不屈挠”,实足以为民国元勋,“先哲的精神,后生的楷范”^①;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,以乾嘉汉学根基而容纳西学新法,自立宗派,卓然大家,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亦有深刻影响。其著作等身,如《诂书》、《国故论衡》、《齐物论释》、《文始》、《检论》、《蓟汉微言》,对近代中国经学、史学、哲学的研究进展,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其文章上追三国两晋,持论仿佛晚周,“守己有度,伐人有序”,高古典雅,自成一格,时人颇多推许。

章太炎一生好谈史学,其推崇之意自始至终。17岁时,就“浏览周、秦、汉氏之书……一以荀子、太史公、刘子政为权

^① 鲁迅: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,第547页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年版。

度”^①，又领悟到“不明训诂，不能治《史》、《汉》”^②，这正是以文字学为基点，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史籍诸子，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史地历法、音律典章的乾嘉学派的治学要求。甚至有“夫报章者，诚史官之支与余裔也”^③的说法。“余少年独治经史、《通典》诸书，旁及当代政书而已”^④，以仲尼为“古良史”，赞同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^⑤的命题，进一步将其明确为“经者古史，史即新经”^⑥，更谓“史在各种学问中，可喻之为皮板”^⑦。其强调史学教育，又说“保存国性，发扬志趣，兹二者教育之根本”，“要点则重在读史”，痛感“近世教育，不痛不痒，志趣消磨，竟成为吃鸦片烟式之教育矣”^⑧。

但遗憾的是，太炎一生，终未有系统条贯的史学著述。吕思勉《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、梁任公》一文中，对于太炎的史学造诣，颇有议论，认为太炎虽然“确是经生，他生平学问，当以小学为第一”，但“康长素和章太炎，虽然都讲经学，而其影响于后来，转以史学为大”。而“康、梁、章三位先生，对于史学上的功绩，并不在于考据上”，具体到太炎，虽然“有一部分精确的见解”，“然亦不过单辞碎义而已”，“这三位先

① 《上李鸿章书》，转引自汤志钧：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，第7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9年版。

② 诸祖耿：《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》，陈平原、杜玲玲编《追忆章太炎》，第82页，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7年版。

③ 章太炎：《实学报序》，转引自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，第50页。

④ 章太炎：《答铁铮》，《民报》第14号，1907年6月。

⑤ 参阅章太炎：《原经》、《明解故下》，陈平原编校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章太炎卷》，第53、69页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版。

⑥ 见本书选入之《论读史之利益》。

⑦ 《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》，1932年秋苏州演讲，徐澍、王乘六笔录，中央大学《文艺丛刊》，第1卷第2期，1934年10月。

⑧ 1924年7月在教育改进社年会上演讲，《新闻报》，1924年7月20日。

生在史学上的功绩，倒还在经世致用的方面”^①，尤其太炎发挥法治之说，如论古代监察制度之类，都能陈古以鉴今，对于时论，有很大的针砭作用。

近世史学大家钱穆，在《余杭章氏学别记》一文中，对于作为“史家”的太炎，也颇有一番会心：

余杭章炳麟太炎，为学博涉多方，不名一家。音韵小学尤称度越前人。然此特经生之专业，殊不足以尽太炎。或艳称其文章，太炎论学颇轻文士，于唐宋文人多所讥弹，谓学贵朴不贵华，枝叶盛而根荄废。自称为文特履绳蹈墨，说义既了，不为壮论浮词，以自污秽。谓百年以前，学者惟患琐碎，今正患曼衍也。又谓非为慕古，欲使雅言故训，复用于常文。其自述文章能事仅此。或又以经学称之，太炎论经学，仅谓六经皆史，说经所以存古，非所以适今。过崇前圣，推为万能，则适为桎梏。亦值并世今文讐言方张，激而主古文，时若不免蹈门户之嫌，然后世当谅其意也。今论太炎学之精神，其在史学乎。^②

由此论推衍之，则作为“经学大师”的太炎，其精神竟是服务于“史学”的。

在《自定年谱》中，太炎曾将时人论学风气与自己何以得益于历史加以比较：

① 吕思勉：《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、梁任公》，章念驰《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》，第170—185页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版。

② 钱穆：《余杭章氏学别记》，章太炎主讲、曹聚仁记述《国学概论》，第159页，香港：学林书店出版社，1971年版。

时新学初兴，为政论者辄以算术与政事并为一谈。

余每立异，谓技与政非一术，卓如辈本未涉此，而好援其术语以附政论，余以为科举新样耳。唯平子与乐清陈黻宸介石持论稍实，然好言永嘉遗学，见事颇易。余所持论不出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、《资治通鉴》诸书，归宿则在孙卿、韩非。康氏之门，又多持《明夷待访录》，余常持船山《黄书》相角。以为不去满洲，则改政变法为虚语，宗旨渐分。^①

钱氏论章氏史学，又特别彰显其主张民族主义、平民主义和文化主义史学，“然则太炎论史，三途同趣，曰归一于民族文化是已”^②。这论断若结合了吕思勉“经世致用”的说法，反观太炎的夫子自道，就分外脉络清晰了：“遭世衰微，不忘经国，寻求政术，历览前史。”^③“国之有史久远，则亡灭之难。……藉不获济，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，足以待后，故令国性不堕。”^④“仆以为民族主义，如稼穡然，要以史籍所载人物、制度、地理、风俗之类，为之灌溉，则蔚然以兴矣。不

① 章太炎：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，1897年，30岁，第6页，香港：龙门书院，1965年版。

② 钱穆：《余杭章氏学别记》，章太炎主讲、曹聚仁记述《国学概论》，第161页，香港：学林书店出版社，1971年版。另如陈垣1943年11月24日致方豪函，谓：“至于史学，此间风气亦变。从前专重考证，服膺嘉定钱氏；事变后颇趋重实用，推尊昆山顾氏；近又进一步，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。故前两年讲《日知录》，今年讲《鲒埼亭集》，亦欲以正人心，端士习，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。”（陈智超编注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，第302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版）。此言或不足以表明太炎或陈垣本人史学思想的变化，却颇可反映那一时期史学学术风气的转移。

③ 章太炎：《薊汉微言结语》，陈平原编校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章太炎卷》，第639页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版。

④ 章太炎：《原经》，陈平原编校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章太炎卷》，第59页。

然，徒知主义之可贵，而不知民族之可爱，吾恐怕其渐就萎黄也。”^①“国家之安危强弱，原无一定，而为国民者首需认清我为何种民族。对于本国文化，相与尊重而发扬之，则虽一时不幸而至山河易色，终必有复兴之一日。设国民鄙夷史乘，蔑弃本国文化，则真迷失本性，万劫不复矣！”^②

本来，“学以求是，不以致用”，乃是古文学家章太炎治学的基本立场，并尝以之与康梁今文学家相抗衡，但当其把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界定为考察“社会政治盛衰蕃变之原”、“知古今变化之轨”^③，则其“学者将以实事求是，有用与否，故不暇计求。……学者在辨名实，知情伪，虽致用不足尚，虽无用不足卑”^④的坚持，其实意在反对曲解或臆造历史（如在前反对“托古改制”、在后置疑“疑古学派”），故而才有“通经致用”、“通史致用”、“读史致用之道有二。上焉者察见社会之变迁，以得其运用之妙；次则牢记事实，如读家中旧契，产业多寡，了如指掌”^⑤等立场更鲜明的说法。他所谓“今日之切要之学”，是要合“求是”与“致用”二者于一炉，这就是“历史之学”。

也正缘于此，尤其“革命种子得之历史”^⑥的见解，使得

① 章太炎：《答铁铮》，《民报》第14号，1907年6月。

② 《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》，1932年秋苏州演讲，徐澍、王秉六笔录，中央大学《文艺丛刊》，第1卷第2期，1934年10月。

③ 章太炎：《中国通史略例》，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三）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。

④ 章太炎：《与王鹤鸣书》，陈平原编校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章太炎卷》，第622—623页。

⑤ 见本书《论读史之利益》。

⑥ 朱镜宙《章太炎先生轶事》文中一记，颇堪为此例证：“先生讲学东京，一日讲《尚书》，汪精卫亦来受业，先生拍手连呼曰：精卫来了，精卫来了。正好，正好。革命党人不可不明历史，精卫应多研究历史。先生且自谓革命种子得之历史云。”见《追忆章太炎》，第170页。

太炎对于明季一段历史、特别是遗民学者顾炎武，情有独钟。

就学术而言，可以上溯浙东史学传统，则太炎不仅深受顾宁人、王夫之等反满民族思想影响，而且与浙东学派代表黄宗羲、万斯同、全祖望渊源不浅。明清以降的思想家中，不乏论述史学以求经世者，王夫之所谓“所贵乎史者，述往以为来者师也”（《读通鉴论》），黄宗羲所谓“学”“必证明于史籍，而后足以应务”（全祖望《甬上证人书院记》），章学诚所谓“史学所以经世，故非空言著述也”（《文史通义·浙东学术》），不一而足。太炎显然受到此辈先贤影响，特别强调治史的重要，尤其主张史学之于国性的关键作用，“欲省功而易进，多识而发志者，其唯史乎”^①。

就现实而言，“晚明记忆”作为清末民初“秀才造反”的一代知识人的文化利器，不可小视。20世纪初叶民族国家革命漩涡中，无论风靡上海的《国粹丛书》、《国粹学报》，还是发行东京的《浙江潮》、《江苏》，其中对宋明遗民的文化追忆，成为一时最热门的话题。太炎不仅于有功焉，而且可能是其中最为洪亮的声音。既然能够写作《客帝论》，以满族入主中国为“客帝”、以中国之“共主”为“仲尼之世胄”，则其思路上法晚明，表面上看来，实在不足为奇。1901年太炎任教于东吴大学，“时以种族大义训迪诸生”，所出论文题目至为《李自成胡林翼论》。1902年在东京倡言举行“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”，以是年三月十九日为明帝崇祯殉国忌日。^②1903年因“《苏报》案”入狱，一度绝食意欲成为谢枋得、刘宗周那样的“饿死之故鬼”。《革命之道德》中倡明“光复会”

① 章太炎：《救学弊论》，陈平原编校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章太炎卷》，第616页。

② 冯自由：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，第14章“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”，转引自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，第122页。

之名，“吾所谓革命者，非革命也，曰光复也，光复中国之种族也，光复中国之州郡也，光复中国之政权也”。都是此种姿态性表示。所谓“十九、二十岁时，得《明季稗史》十七种，排满思想始盛”^①，“弱冠，睹全祖望文，所述南田、台湾诸事甚详，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；次又得王夫之《黄书》，志行益定”^②，就此而言，实在是“革命种子得之历史”^③了。

章太炎之“神似”晚明遗老，似乎当时已成公论。这不仅表现为宋恕“君以一儒生，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，云何不量力至此，得非明室遗老魂魄凭身耶”之类戏言；更体现在章去世之后，所收到的挽联中，对此几乎众口一词，其中蔡元培的挽联，可谓典型：

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，驱鞑复华窃比遗老；

与曲园仲容兼师友风义，甄微广学自成一家。

平心而论，尽管在近现代文化语境中，追忆“晚明”、尤其是上法“遗民”，一度成为中国最后一批富有“士人”气息的文人口中笔下十分仰慕的“风骨”，但其“拷贝”结果，往往是各取所需，有意误读，致使清末民初文人的“晚明想象”，即使不是“放大”的，至少也是“变形”的。太炎于此，似乎早有警惕。

章氏有言，“余于晚明遗老之书，欲为整理而未逮也”，因

① 朱希祖：《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》，《制言》半月刊，第25期，1936年9月。

② 章太炎：《〈光复军志〉序》，陈平原编校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章太炎卷》，第401页。

③ 左舜生曾回忆：“余平日在先生处所闻，以明末遗民故事及清末革命故事为多，盖前者为先生革命思想之所自出，后者则先生曾躬与其役者也。”见《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》，《追忆章太炎》，第350—351页。